

中国近代

书籍装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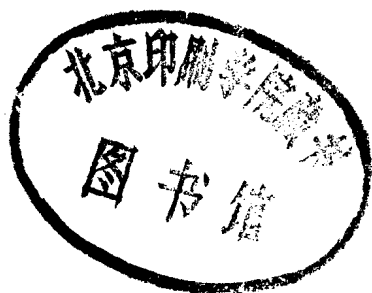
罗小华编著

人民美

T588
90-3

中国近代书籍装帧

罗小华编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近代书籍装帧

罗小华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编辑、设计：姜 冶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0 年 10 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102-00760-4/J.705

定价：4.90 元

鉤沉
為報
熱心
為心

祝賀“現代中國書畫藝術”首屆展覽

丁卯子聖

我国的书籍装帧艺术发展到“五四”时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即进入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历史阶段。

对于书籍装帧艺术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现代书籍艺术新运动的崛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作为实用艺术的书籍装帧改革运动，一方面从属于革命运动本身的需要，涌现出大量以新思想为内容的新作品；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催化了书籍装帧艺术的新生，无论从表现形式上或艺术观点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变革。

五四以前的书籍艺术基本上是沿用着古籍线装书的形式，虽然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出现了探索性质的书籍装帧形式变革，但仅处在幼稚的阶段，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四以后，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从以往偏重于制作工艺范畴中解脱出来，开始了面向广泛的平面艺术领域横向扩展，挖掘了构思与表现的艺术潜力，使书的装帧艺术产生了历史性的新飞跃。

由于书籍种类骤增，内容十分丰富，书籍装帧艺术（以下简称书装艺术）在发展中表现出指导设计思想开始注意与书性紧密结合的趋势，在表现形式上更广泛、更大胆地

结合了绘画、装饰图案、书法、篆刻、摄影及现代抽象艺术表现等手法。这使得书籍装帧艺术诞生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局面。作为一门年轻的、充满生命力的新型艺术，其特点是平面艺术与立体艺术，独立艺术与实用艺术两者兼而有之，以它特有的功能波及到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

五四后的书籍品种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报纸、期刊、各种类型的文化书籍、社会科学书籍、教科书、政治书、自然科学书等等几乎无所不有。但受书籍装帧艺术运动波及较大的，主要是社科文艺书与期刊杂志两大部类。

期刊杂志据史料记载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兴于五四时期，盛于大革命时代，据《辛亥革命杂志录》统计，从1905年同盟会创办《民报》开始至1912年《真相画报》《新纪元》杂志为止，主要杂志约30多种，1919年——1920年仅两年时间创办杂志近百种，1921年——1927年春，仅各党派创办的各种杂志竟高达500多种，超过历史上以往各时期所出主要杂志的总和，还不包括门类繁多的文艺类及其他期刊杂志。

在这段繁荣的杂志期刊史时期，寿命最长的《东方杂志》长达四十五年之久。它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到全国解放时终刊。寿命较短的例如《耕耘》，仅出二期。

如上可见，五四时期期刊杂志在书装艺坛上乃是占据了一席显眼的位置，无论是品目繁多的社科文艺类书籍，还是繁荣昌盛的期刊杂志，自从踏入现代平面艺术大门，经过不断进化、不断革新的探索之后，大约在大革命前后，开始了各具特色的分化。书的设计越来越走向个体化、书性化和专题性内涵意义的表现，而杂志期刊则逐步转向醒目、概括性强和形式感较强的表达风格。虽然它们同样接受革命运动的洗礼，同样被艺术家们广泛吸收外来营养进

行创作，但它们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们必然地按照自己不同的职责各寻其路，而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它们又在大体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倾向。

每一次艺术新潮流的到来，都不是凭空而起的，现代书籍艺术的兴起，也决非出自偶然。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大旗，人们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种外来的文艺被引入，形成了中西文化交融、古今文化对抗和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在出版业的兴盛年代，图书种类出现了多元性的开发，书籍艺术旧的语言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无法满足人们新的审美意识的需要，新的语言就必须形成，早在辛亥革命初萌芽的书装艺术，随着历史气候的形成，就自然而然地迅速成长起来。

现代书装艺术的发展大约可分如下三个时期：

（一）二十年代初期——二十年代中期，为新旧交替转变时期；

（二）二十年代中期——三十年代后期，为书籍装帧艺术繁荣兴盛时期；

（三）三十年代后期——四十年代后期，为稳步发展时期。

事实上，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阶段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为它们虽有不同时期的区别，但又相互联系交叉和相互渗透。

下面，分别谈谈三个时期。

（一）二十年代初期——二十年代中期

近代书籍装帧在这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古今交错，新旧杂陈，中外交融。

出版界迎来了产业革命，纸张、印刷工艺迅速发展，必然带来了书籍装订和装帧的改革。虽然线装书的形式仍然存在，但由于大量的印刷纸张已经改变成双面印刷，装

订也随之改变，书的开本也因为文字横排的改变而变化成由右开本到左开本。毛边书也日趋倾向切边书了。从装订印刷的角度来讲，新旧交替的特征已是十分鲜明了。

自从引进西方现代印刷和装订术以来，人们立即敏感地注意到书籍封面设计及装帧艺术的改进工作。随着工艺过程的逐步进化演变，封面首先在字体上找变化，由规范的、格式化字体改变成多样的、活泼的字体和布局，甚至用几个铺满封面面积的大字来突破陈旧的构图，由此发展到加点、线、面块的装饰，以及图案、花草……，直至绘画手段的直接渗入……。

二十年代初，书装艺术继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新萌芽之后，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法逐步形成和发展，突出的进步是大胆地引用绘画手段于书籍的封面上。最初多采用直接将绘画艺术中的形象“摘取”下来，照搬到封面上，或进行一下排列、组合，由于所摘取的形象本身是经过推敲成熟的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使书的封面装饰得颇有新意和美感。只是照搬绘画形象的设计其用意虽是唯美的，有些却并未考虑与书籍内容究竟有多大关联。这种表现形式在当时很时髦，许多书的封面上开始出现了与书的内容不相干的希腊瓶画、古埃及人物画像以及西洋画中的一些人物造型，至于图案则更是毫无顾虑地应用了。也许是受当时绘画思潮的影响，书籍艺术出现了热情冲动、积极向上的探索局面。我们姑且不论“唯美”主义的照搬是否适合书装艺术的特性，是否合理，就其重要意义来说，在于它使书装艺术在创立属于自己的成熟的特殊语言之前，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过渡作用——它闯开了绘画手段的大门。

例如1923年出版的《隔膜》，此书封面采用了西方图案与人物相结合的画面，看来精致、庄重，突出了绘画效果（见图10）。还有如《三叶集》一书，寥寥数笔点出了几

枚叶片，毛笔签名，构成了一幅中国画风格的封面设计（见图12）。

在这个时期里，期刊杂志的设计同样十分活跃。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火炬——《新青年》杂志影响力最大，其封面设计也有一定的特点。《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据有关材料记载，该杂志第一个采用了新型美术字体为封面题名。《新青年》于1920年迁至上海，该期的封面设计显然比以前构思深化，表现力增强。三个醒目的大字位于上方，下面是一个地球图案，从地球图案左右两侧伸出强有力的两只手紧紧相握，象征革命力量的团结和战斗力。此图案的运用如它的内容一样鼓舞人心。

1920年，郭沫若、成仿吾等创办创造社。《创造周报》是创造社第一期的代表刊物。创刊号用行书题名，下面是米开朗基罗为sistinu教堂所画《人的创造》，这个借用的壁画是寓意丰富的。

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封面上多介绍欧洲名画或雕刻，它展示给人们的同样是一个新的视野。

当时封面设计的另一种倾向就是使用一些有古版风味的，初期不甚成熟的图案与花草之类的装饰手法，今天看来可能过于陈旧了一些，但在当时许多期刊杂志都模仿这种风格的图案和版式，如《莽苍社刊》、《教育杂志》等。

二十年代初，杂志封面用妇女形象的较多。“鸳鸯蝴蝶派”书曾很为流行过一时，多用一些旧月份牌、旧化妆广告上的软绵绵的妇女形象来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在出版界里，只图赚钱的出版商单纯为打开销路而装饰门面的书封设计也不少。例如《红玫瑰》、《中华小说界》、早期的《小说月报》等等。（见图14、17、2）

对于这一类设计，在当时就曾受到舆论批评，并有文字记载。闻一多先生曾说道：“那些美人怪物的封面，不要

说好看，实在一文不值。他们已经有人批评了，我不必讲。其余完全没有艺术的气味的也不必讲了，只把最坏的提一提……”。

从二十年代初期转至中期，妇女方面杂志也开始有新的转变。《新女性》、《妇女杂志》等刊物开始追求新意。《新女性》画面显然是吸收了西洋画构思（见图 206），寻求表现一种纯真、无私的母爱，手法也不再是矫揉造作的媚态，而是黑白简练的处理手法，靠动势传情来表现。《妇女杂志》也画出了当时妇女在五四运动后的时髦衣着，表现得端庄、含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个时期的书籍装帧除去上述的主要艺术特征之外，也出版了借鉴而不是照搬西方艺术，探索书籍艺术形象语言的新天地的少数作品，这些作品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潮流的到来。

（二）二十年代中期——三十年代后期

这个阶段的书装艺术发展变化比较大，它经历了几个转折，但最主要的特征是多样化，繁荣兴盛。

这一阶段文艺社团越来越多，出版界和艺术界空前活跃。艺术领域中的探索由最初挣脱束缚时的热情冲动转向内在的思索和探求。这个时期外来艺术的引入已不再是仅限于照搬形象，而是发展为借用西方艺术手段和方法直接为己用，形式与内容相符合的作品越来越多了。随着艺术派别的纷争，书装艺术吸收外来艺术的种类也随之多样化夸张、抽象、写实，无所不有。这是一个生动的、开放的，并带有探索性的书装艺术的兴盛时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书装艺术事业培养出了一批当代的书装艺术家，这是因为当时各出版社大多没有专职人员搞设计，书装艺术吸引了社会上从事其他艺术专业的艺术家们，形成了三十年代书装艺坛上一支半专业性的活跃队伍。

这一时期，受现代派、未来派、早期立体派等等流派影响的作品十分引人注目，无论是期刊还是书籍的封面都如此。

早在上一阶段就已经出现了这类作品，例如《巴黎麟爪》（闻一多设计），画面用深色衬底，显出阴郁、压抑之感，在这沉闷的空间中，出现眼睛、鼻子、手和腿的局部，分别安排在非合理组成的位置上，几个象形字作为书名神秘而又恐惧地点缀了主题。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是特殊的，设计者用这种表达方式试图更逼真地反映主题感受，并恰当地传递给读者（见图 206）。象这样的设计，到 30 年代就相当多了。

《黑假面人》（见图 207）运用了一种既怪诞又十分具有特点的画法，醒目的黑白处理，通版表现了《黑假面人》的面具。作者刘漂是从事建筑设计的，但这一作品的风格极有特色。

《上帝的儿女们》显示了三十个十字架中一个女人体在挣扎的形象，远处有起伏的陆地山峦。画面没有直接阐述任何细节，但封面的形象已经造成了悲剧气氛。（见图 208）

《自剖》，徐志摩著，封面是一幅别具风格、生动活泼的构图。画面用洒脱的手法勾画出由花叶纹样组成的装饰，中间一幅自画像，用鲜红色的“箭”代替鼻梁，冲向发际。画面诙谐、幽默、发人深省，一幅活生生的自剖像。这幅作品没有直接引用西方现代派手段，却应用了现代绘画中几何形与人像大胆结合的手法，画面构成似乎是随心所欲，却巧妙地点出了主题。（见图 211）

许多期刊杂志的封面也十分敏感地采用了这些手法。

《现代》杂志的几期设计（见图 211、212、213、214、215、216、217）（1932——1933 年时期的作品）十分明显

地树起“现代”派旗帜，无论是变形人体还是线面构成都表现着“现代”化，显示出《现代杂志》借鉴外来艺术的能力。

《诗刊》杂志(1931—1932年)的封面设计清新、悦目。特点是中外交融，装饰感很强。无论是用版式设计语言，还是美妙和谐的书名字组合；也无论是用漫画装饰性地刻画非漫画的人物肖像(志摩纪念号)还是改制或选用了西方现代派点线面黑白画，都赋予了画面诗的构思，塑造了当之无愧的“现代诗刊”的风格。

《电影月刊》封面设计十分大胆，这里主要所指的是1927、1928、1929这几年的设计。无论是构图还是表现手法，都体现了设计者们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敏感：既有抽象的表现(见图221)，又有近于表现主义的比亚兹莱画风的影响(见图222)，甚至也挪用了至今又时髦起来的色彩渐变手法(见图223)，并且也没有忘记从敦煌飞天那里摄取一些艺术韵味。

期刊杂志的嗅觉是敏感的，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艺术。

这时期的书刊艺术特征其二是：风行构成主义设计。包浩斯艺术潮流挤进中国工艺美术设计艺坛。这个国际上流行一时的设计潮流迅速波及了兼有绘画艺术与实用艺术两者的书装艺坛。许多书封、杂志设计采用了这种手段以加强形式感，突出自身的设计特点。

《建塔者及其他》这一作品用几何线和圈套住一半木刻插图，书封字也未忘记形成统一的艺术风格。《爱之涡流》版式设计等都属于接受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并加以充分发挥。(图107)

《中国词史大纲》是一本文史书籍。画面用一个圆形图放在斜上方，加二竖色条作为最简练的构成。这个时期

的文史社科书籍已经开始找到抽象语言作为自己封面的装饰，“构成主义”的设计方法便成了这种设计的常用手段之一。

期刊杂志的封面设计中这些方法更是屡见不鲜。

特征其三是：“照搬艺术”已远远高于过去的水平了，明显地有了主题性的挪用，注进了设计者的构思方法，将“照搬”变成代言和借用。

特征其四：民族风格的追求成为几大风格之一。

《甲寅》杂志的设计是一个较突出的典型。这个杂志提倡国学和传统，与此相呼应，封面设计采用了中国古典形式，利用了古代器物造型，古色古香又十分醒目的“甲寅”二字巧妙地“溶进”物体的适形造型图案中。为更突出“甲寅”之意，并精心刻画了一个富有生气的虎放在下面。整个设计十分醒目，风格鲜明突出而毫无雕琢之感。陪衬的底纹和安放的年款字样都颇为恰当，这是一个民族形式感较强的设计。（见图227）

鲁迅先生设计《国学季刊》也是同样以国学风格为主调，用传统味道的图案作底，行书（蔡元培题字）为名，与书性十分贴切。

对于吸收外来艺术或追求民族风格，鲁迅先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是中国风，只要观者能够看懂，而采用合意者。”特征其五：日本艺术风格反映在书装艺坛上形成一大特点。许多设计者是留学日本后返回祖国，也由于日本艺术的引进较为活跃和日本出版界与中国出版事业的交流频繁。总之许多封面设计受日本影响较多，关于这点我们在人物与代表作品中还要介绍。

特征其六：是图案的应用。图案是设计领域中不可缺少的语言。这个时期刺图案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西欧图

案、东方图案、古典图案、日本图案……种类繁多，是多元化、富于生气的。

《教育杂志》、《莽苍社刊》、《东南评论》等(见图228)代表了当时部分书刊设计的面貌，较多地采用图案手段。这一时期类似的设计以西洋图案为多。有的在图案的装饰下，偶尔插入插图式的木刻画或黑白画，这种方法广为采用。

《前途》的封面设计很有意思，这个刊物十分注意刊名美术字体的变形表现。画面以一匹马正驮着一个张弓欲射的人的身影，箭头指向刊名，在形式感上使人目光浏览了封面图案之后又顺势自然地回到刊名上。装饰人物与色块分布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充满着柔与刚、圆与方的矛盾，相对衬托出较鲜明的形式感，给人以较强烈的印象。

特征之七：是用各种字体表现作品。或讲究变形，或讲究排，或讲究书法字体的风格。相当多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字体艺术的表现力。如《家》、《汤姆莎耶》、《萌芽月刊》(见图233、232、231)等作品。此外有些作品已经进入较深沉、成熟的构思和表现方法，以特有的形式来表现特定书的深刻寓意(这部分作品下面在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一段中还要介绍)。例如《过去的生命》(见图234)，从一个黑色窗孔中，显现出过去的、消失的生命所留下的似有似无的点、线和环绕的影子……以较多的省略和空白，给读者留下无尽的联想。

这个星段由于革命运动本身的需要，写实理旬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就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段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三十年代的书装设计风格是与各种书装艺术设计思想探讨同步的。可惜有关文字资料太零散，无法进行系统化

的整理。

（三）三十年代后期 — 四十年代后期

这个时期的书籍装帧艺术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

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突出了民族化的追求：写实主义、漫画手段以及解放区泥土味的风格。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逐步形成特有的含蓄、明快、书卷气的总特征，出现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

它们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运用了具有时代特点的装饰手法，从而提高了书的艺术价值。

《生命的O度》（图72），臧克家著。画面在左下角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半面人像，妙在用竖线切断了另一半面孔，使人觉得他似乎躲在什么后面，一付苦涩、阳郁的表情，伸出一只手——一只自己的手去填写书题名字中的“零”字。红色的“零”是画上去而不是写去的，增加了活跃的气氛，并与人面画相通，合理地附进了黑色封面字的行列中。设计者的构思是有深度的，有创造性的。

《上海屋檐下》是把变形的、现代装饰感很强的舞台布景“取裁”下来，如同舞台旁边的字幕——表现了戏剧丛书的特点。（图236）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小巧、清新、典雅、明泽。设计语言不多，却创造了书卷气很沉的风格。《旅人的心》是其中一本，它以小26开取胜，选用了清秀玲珑的小字体，青莲色书名字与黑色的其它文字合理排列，没有其它装饰。这套丛刊中的每一本书还有一个精巧的外套。用这样清新的风格装点散文丛书，很快被作为一种模式延读下来。这在当时是接有影响并受欢迎的书。

这时期装帧艺术也有部分作品仍旧在照搬其艺术，但

此时的照搬已经明显地成熟起来。《雪·荒乡·马车》一书的设计就属于这类范畴的作品之一。画面引用了西洋画中线描女神的形象，体态轻盈，线条流畅，选用六种不用姿态分别用在封面和封底。由于所选人物造型本身是精美的艺术创作，加之整体设计的排列讲究，使书的面貌顿增光彩。

值得注意的是，整体设计是现代时期创新之举。在前一阶段的设计中，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书籍封面、封底、扉页、环衬的设计，到这一时期，则已经发展到具有整体设计思想，进行有层次、有布局的合理安排。丛书种类也产生了丛书设计规范，即统一格式，变幻局部等等手段而突出丛书特征。这一切标志着书籍装帧已经开始了自身体系的创立。如果说五四运动为现代书籍装帧运动的起点，应该说其成就是伟大的。

《呼嚎》也是一幅“照搬”手段用得较贴切的作品。画面选用的是珂勒惠支的一幅版画作品，作品本身加强了书性的气氛。（图75）

版画作为书封设计的手段之一，要归功于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扶助。作品《沸腾的岁月》、《大渡河支流》（图76、77）却是运用版画形式，表现了强烈的爱和恨，使书的封面笼罩上一层触动人心的强烈色彩。作为写实主义手法，写实主义的版面发挥了其自身的特点，版画画种在书装艺坛中始终保留了下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用版画装饰书籍，将来也一定成为必要，我希望一定不要放弃。”

在这一时期，像《时事日报》那样采用漫画对比手法勾画正反面人物的形式很多。战时的需要使漫画手段充实为书籍艺术语言，并且兴起一阵高潮。用漫画这种尖锐、鲜明的形式来表现愤发的情感，在一段时间里成为画家们运用自如的方式，扩大了创作者和读者的领域，曾起到不

少的影响和作用。

写实手法的盛行，是由宣传抗战、唤起广大民众觉悟的现实需要所必然派生的艺术黑潮。既有像《民锋》封面那样采用全付武装的女战士阵容题材的摄影作品，也有像《野草》封面那样，用含蓄、辛辣的小题图来体现“野草”顽强不屈的生命力。这些作品代表性地显示了这阶段的书装艺术比过去深沉和成熟起来，设计者已经能自如地运用恰当的艺术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书籍的内容。

解放区的书籍装帧艺术带着特殊的泥土芳香，朴实、大方、亲切、生动，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但由于出版条件比较艰苦，出版所需要机器、纸张、油墨等供应困难，大大地限制了这类书装艺术的发展。

1937年延安出版的《解放》周报创刊号，封面设计了两个象征人民力量的人物形象，摔脱旧世界的锁链，用粗犷有力的“解放”二字连同拼音字母构成新颖的构图，富有强烈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像《新长征》等类似作品都属于这一范畴。

延安解放社连出版了很多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常用木版画代替制版，直接印画和手写字体。这类书大多设计严肃、庄严、简洁。

文艺书籍的设计，如1944年冀鲁书店的《李有才板话》，1948年陕甘宁边区出版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书，装帧十分别致、朴素，与文学作品风格十分吻合。后者为了适合长篇叙事诗的特点，特意将开本设计成横32开，黄色土纸印刷，巨色封面，两位主人公在风暴中的田野上，稚拙的版画味道与农民的朴实风气融为一体。

《参战英雄录》（冀鲁区后方指挥部）《八路军的英雄们》、《秧歌剧》等作品有些是油印的，有些是牛皮封，偶遇上条件略好些时也有用二三种颜色的。多数是版画装饰。